



悲欢离合

李惠文 著

7

社

悲 欢 离 合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京 安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25 印张 110 千字

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01——100000册 定价：0.40元

目 录

郑北星上任…………… (1)

人 心…………… (31)

悲欢离合…………… (69)

· 郑北星上任

一

原来那个靠打砸抢起家的县委书记，揭批“四人帮”的战役一打响，就让群众的一顿大字报给糊趴下了。上级又派来个新县委书记，姓郑，叫郑北星。

可这郑书记到任两三个月，机关里的干部却很少见着他的面，因为他经常在下边，就是回来开常委会也是会散人就没了。对此，机关干部看法不一，有人说他是深入基层；也有人说他是怕事躲事，不经常露面比较安全，那些震派人物抓不着人影儿，想找邪茬找不着。可是最近，震派人物还是找到邪茬了。今天早上在县委大院的门口就突然出现给郑北星贴的一张大字报，标题是：《郑北星拜访反革命！》

见了这张大字报，别人倒没啥反响，县委副书记老余却有点坐不住板凳了。因为那大字报虽然是给郑北星贴的，可字里行间也牵扯着他，说他在一次常委会上也为那个反革命分子鸣冤叫屈过，郑北星前去拜访，绝不是偶然的现象。……余建瑞看完了大字报，心里就埋怨起老郑来：你下去工作该抓啥就抓啥，无事生非的，你去拜访他干什么！净惹刺子！于是，就赶紧往下边打电话，找郑北星。

他刚抓起电话，知青办主任，外号叫黑雷公的大个子进来了。这小子三十多岁，脸色象烟囱塞子，尖脑袋，脑瓜顶的头发象个鸡毛毽儿。

“余书记，我向你问个事儿，”黑雷公冷着脸子道，“我们听说上次常委会上，还有人主张要给八年前畏罪自杀的陆仁书记翻案，这到底是谁的主张啊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余建瑞迟疑一下，“那只是大伙议论一番，并没入主张给他翻案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”

“打听打听！”黑雷公阴阳怪气地说，“必要的时候，我们好贴出第二张大字报！”

“贴大字报随便，”余建瑞有点忐忑不安的样子说，“运动嘛，大字报越多越欢迎！”

黑雷公哼了一声问道：“给郑书记贴的大字报，你看了吗？常委应当做出什么反响？”

余建瑞连忙说：“我正要给他打电话，把他叫回来！”

“那你就打吧。”黑雷公说罢，转身走了出去。

余建瑞斜了一眼黑雷公的背影心里斥责道：什么东西！一时不闹事你也不好受！

他长出一口气，这才开始拿电话找郑北星。他知道郑北星到山区去了，究竟在哪个公社，他不太详细，就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找，一直找了四五个公社，才算抓住点影儿。公社干部告诉他说，郑书记到豹窝岭去了。余建瑞心里嘀咕：这老郑，也不怕金钱豹把你吃了！他接着让公社话务员转豹窝岭。

“你是豹窝岭大队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是大队干部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给我找大队干部说话。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你是干啥的？”

“社员。”

“你知道不知道县委郑书记上你们那儿去了？”

“前两天县里是来个干部，我不知道是不是！”

“你说说他的长相我听听。”

“他的长相嘛……”对方想了想，“他中乎溜的个儿，五十郎当，花白头发象下霜，笑眯眯的眼睛高鼻梁，右耳朵上好象有个拴马桩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别说啦，正是他！”余建瑞急切地说，“你快点把他找来说话！”

“他昨天走啦，上五顶山公社那边去啦！”

“你看糟糕不糟糕！刚有点影子又失踪啦！”余建瑞又只好重新要电话局。

二

此时此刻，老余用电话是难以找到郑北星的。郑北星现在正住在大字报里所说的那个反革命分子家里。昨天，他从豹窝岭出来，一踏进五顶山地界，就让一片茂密的松林把他吸引住了。他走到松林里，碰见了老护林员，就盘腿大坐地跟老护林员唠扯起来。这护林员是五顶山脚下骆驼庄大队的，名叫赵昆，六十来岁，满脸络腮胡子。他是前两个月去

县里参加劳模会认识郑北星的。

郑北星呢，却不管认识不认识，他到下边来，见着哪个社员都是自来熟，两句话过不去就亲热地拍起对方的肩膀。他象一锅开水，把你扔进去，不熟也得熟。

他们脸对脸的盘腿坐在松林的草地上。郑北星掏出烟斗，拿嘴通了通，有点堵，随手拾起一根干枯的松针，一边通着，一边笑呵呵地说：“你看守这片松林可是有功劳啊！”

老赵昆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我有啥功劳，真正有功劳的人没喽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就是八年前死去的那个老陆书记，”老赵昆把烟包递给郑北星，“这片松林是用他亲自带来的松苗栽植成林的。那时候他提出一个解决全县人民吃烧花的口号，就倒霉了！那些冒牌的造反派生拉硬拽把他打成走资派，五尺多高的大帽子扣在脑袋上，游斗了三个多月，到末了不知还怎么自杀啦！唉！那老书记真让人想啊！这股山道和这片松林没少留他的脚印呀！”

两个月前郑北星调任到这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，市委领导就向他交待了陆仁同志的不白之冤。在常委会上，也曾几次议论陆仁同志的自杀问题，但多数同志则认为自杀就是一种叛党的行为，没法为他申冤昭雪。他这次下来就是要听听广大群众的意见；到陆仁同志经常工作过的地方，了解了解群众的心情。有些事情往往是下边比上边看得清楚啊！烟斗里冒起烟之后，他向老赵昆问道：“老陆书记提出的吃烧花口号，你们认为对不对呢？”

“咋不对？”老赵昆激动起来，“社员们要都缺吃少烧，挎兜子一掏都是漏底的，那还有什么劲头建设社会主义！”

郑北星一听笑了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是啊！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为着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，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；如果越建设越穷，连饭都吃不上，就没人愿意干社会主义了。可‘四人帮’就是主张越弄越穷，要不为什么说‘四人帮’是祸国殃民呢！”

老赵昆打了个唉声，说：“老百姓遭殃总是还活了一条命，可象老书记那样的好干部，就委委屈屈死在九泉之下了！谁能为他申冤哪！还有我们公社原来那个张书记，跟咱贫下中农真是心贴心，可‘四人帮’不知咋弄的，把他打成反革命啦！送进监狱押了好几年，眼睛也瞎了，现在成了废人啦！”

郑北星听了老人的这番诉说，心里感到阵阵绞痛，他情不自禁地问道：“他是不是叫张维丰！”

“对，”老赵昆感叹地样子说，“现如今在家凑合活着哪！戴着反革命的帽子，双眼瞎，也没人搭理！”

“他家在哪？”

“远啦！在山那边，叫卧虎沟。”

对于张维丰的情况，郑北星到任以后，常委会上也曾经议论过，但是很少有人替他说句冤屈的话，也许是因为他现在仍然戴着反革命的帽子吧！

陆仁也好，张维丰也好，这两个案子，在郑北星的心里原来都是一团雾。现在听了赵昆老人片片断断地诉说，似乎扒开了一点缝儿，他要顺着这个缝摸下去，一直摸到晴天拉

倒。

他跟老赵昆又唠了一阵护林的事儿，就辞别老赵昆到庄里去了。

骆驼庄不大，三十多户人家，是一个生产队。晚上，郑北星召开了贫下中农座谈会，通过这次座谈，郑北星心里那团雾似乎消散了，看清了被雾体笼罩着的事物的本来面目。他决定要亲眼见一见那个受迫害的公社党委书记张维丰。自己是县委书记，这样做也完全是应该的呀！

在骆驼庄住了一宿，第二天一早，郑北星就爬过五顶山，往卧虎沟那边去了。

他到了卧虎沟已经过晌了，掏出随身带着的干粮打打尖，就往沟里走去。这卧虎沟住的人家比较散，东坡一家，西岔口一户，他刚想找人询问一下张维丰的住处，眼前走过来一个干部模样的年轻人，便热情地问道：“同志，我打听一个人你能知道不？”

“打听谁？”

“就是以前在这个公社当党委书记的张维丰，在哪儿住？”

“张维丰？”那个年轻干部手一指说，“你往东沟里走吧，看见一个孤家就是。”

郑北星又问：“他能在家不？”

年轻干部说：“他不在家上哪去，是个瞎子，又是反革命，你跟他怎么认识？”

郑北星打着含糊语说：“是一般同志关系。他的眼睛怎么瞎了？”

“唉！那就不用说喽！”年轻干部长出一口气，“打成

现行反革命以后，就被弄到县里专政，眼睛就不明不白的瞎啦！”

郑北星看这个年轻干部很同情张维丰，就想跟他详细聊聊，便在地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，用恳求的语气说：“同志，我求你详细唠唠张维丰是怎么打成反革命的，可以吗？”

年轻干部迟疑了一下，稍有戒备的样子问道：“同志，你是……”

“我是县里的，姓郑，”郑北星坦然地一笑说，“调到这个县不久，听说张维丰同志被开除回家了，特意来看看他。小同志，你贵姓？”

“我姓吴，叫吴春。”

“有关张维丰的事，你全清楚吗？”

“全清楚，”吴春也蹲下身子，“那时候我在公社当勤杂。张维丰……现在不能称他同志了，那是个平易近人而又朴实的老干部。他经常穿着带补丁的衣服，可人家就说他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……”

“穿带补丁的衣服怎么是污蔑社会主义？”郑北星禁不住问了一句。

吴春风趣地说：“那时候讲究无限上纲嘛！一个公社党委书记还穿带补丁的衣服，那社员该当如何？那不是污蔑社会主义是什么！”

“真是岂有此理！”郑北星忿忿地说。

“这只是一条，还有哩！”吴春继续说，“他挣的工资较高，家里人口少，负担轻，有时到下边看哪个社员生活困难了，就拿出十块八块。人家就说他这种做法是刁买人心，

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的污蔑，也是对党的一种耻辱。说他想把自己打扮成比共产党还伟大的救世主。后来，人家又说他追随县里走资派，大肆推行吃、烧、花的黑纲领，是修正主义。他不服，跟人家辩论说：‘不搞吃、烧、花，难道让社员搞社会主义喝西北风？’这句话说糟了，人家就给他扣上了对现实不满的大帽子，说这是一种反革命言论。前后一拴辫儿，罪名就超出了走资派，变成了现行反革命，工作组往上一报，就把他抓进了监牢。”

郑北星问：“是哪的工作组？”

“县里的，”吴春说，“工作组长姓魏，外号叫黑雷公，现在在县知青办当主任。”

郑北星“嗯”了一声。他到任不久，就听说黑雷公这个人了。他是造反上来的，好闹事，是趴下的那个县委书记的一个得力的打手。郑北星早就想把他那个知青办主任拿掉，可老余总担心怕他闹哄，意见总也没统一。

“小同志，我再问问你，”郑北星顿了一会儿问道，“你认为象张维丰这样的案子，算不算作冤案？”

吴春若有所思地说：“算冤案又能咋的？谁能敢给他平反？”

“怎么不敢？”郑北星理直气壮地说，“现在‘四人帮’打倒了，凡是冤案就要平反嘛！”

“嘿嘿……”吴春诡谲地笑了，“首先我们公社的头头就通不过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是对立面嘛！”

“怎么个对立面？”

“不把张维丰打倒，我们公社的头头怎么能当上书记！”

这时候，郑北星看看天色，太阳已经栽西，就向吴春告辞说：“小同志，谢谢你了，以后有机会到县里再会。我得抓紧时间看看那个张维丰同志去。”

“要注意，”吴春担心地说，“他现在毕竟还是反革命。我们公社的头头还在这个大队蹲点哪！要让他知道，会招惹是非的！”

三

郑北星离开吴春，就奔向东沟的一个独户人家去了。他一边走着，一边想着心事，想着象张维丰这样受害的干部全县还有多少？公社以上的干部，大致清楚了，那么大队一级的呢？全县三百多个大队，两千五百多个小队，到底有多少受害的？自己还不太清楚啊！要大治快上，那些受害的同志得不到沉冤昭雪，怎么能调动全县人民的积极性？冤了一个县委书记，就屈了全县人民的心哪！

他怅惘地来到独户人家的门前了，叫出了院里的主人。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，衣着很不整洁，手里拿根烧火棍子。郑北星语气亲切地问道：“老大嫂，您贵姓啊？”

老妇人一见是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她的门前，心里禁不住嘭嘭跳起来，结结巴巴地回答说：“我们……姓张，孩子她爸……叫张维丰，您是哪的，同志？”

“我？您不认识，”郑北星温和地说，“张维丰在家吗？”

“不在家，”老妇人提心吊胆的样子说，“您找他有事？”

郑北星看老妇人对他怀有戒心，就以推心置腹的口气说：“老大嫂，你不要害怕，张维丰是我过去的老同志，多年不见了，我想看看他！”

“哎哟！如今还有人敢看他！”老妇人稍稍坦然一点了，“您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他可是个瞎子啊！”说完这句话，她忧伤地皱了皱眉头。

郑北星用肯定的语气说：“没找错，他不是当过公社党委书记嘛！”

老妇人打个唉声说：“别提那个啦！他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了！因为这个，我也不敢把同志往屋里让。叫我闺女找她爸爸去吧！”

郑北星连忙摆手说：“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找去。他在哪儿？”

老妇人抬手一指说：“就在对过的桑林里给队上看蚕哪！你听，敲洋铁桶的就是他。”

“好啦，我顺着声音找去，”郑北星转过身子，就冲着对过山上桑林里“当当”的敲桶声走去。他踏进桑树林，那“当当”的敲桶声也越来越近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就见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坐在一块石头上，两腿夹着一只洋铁桶，不住地在敲。他仰着颞儿，两只蒙着蓝皮的眼睛向上翻翻着。

郑北星在他面前站了一会儿，想搭话又不知说句什么好，就轻轻地咳嗽一声。张维丰听见有人咳嗽，停下手里的木棒子，问：“有人？”

郑北星这才搭声：“啊，你在这干什么哪？”

“蚕上山了，我在这儿哄雀儿，您是谁呀？”

“你不认识，”郑北星柔和地说，“你叫张维丰吗？”

“是我！”张维丰的嘴唇哆嗦一下，“您是……公安局的？”

“不是，”郑北星口气亲切地说，“你不要害怕，我是县里的，特意来看看你！”

张维丰干咽了一下嗓子，心里猜测着眼前这个人的来意。以前，他怕来人找他，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他盼来人找他。这大概也是对自己的问题怀有某种希望吧。但是，当他还没有弄清对方的来意之前，他还是不敢冒昧地解脱自己的反革命身份。尽管他相信：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了，自己的问题总有出头露日之时，可谁知县委目前对自己的问题怎么看呢？如果也象公社头头那样……于是他试探着说：“特意来看看我？我是反革命，又是个废人，看我有啥用！”

郑北星当然理解对方此时此刻矛盾着的心情，又接着问道：“你当过公社党委书记吗？”

“唉！那是过去的历史喽！”张维丰颤抖着双手，“我现在眼睛瞎啦！别的干不了啦！只有在这敲铁桶，能为社会主义做点贡献，我就觉着没有白白活在世上！”

郑北星听着这句话，再看张维丰那种双目失明的样儿，心里象刀绞一般，语气深痛地问道：“把你打成反革命，你感到委屈不？”

“这话让我咋回答！”张维丰长叹一声说，“委屈不委屈，历史会给我做出公正结论的！我相信党，我相信群众。”

郑北星知道，对方的这些话，仍是对他怀着高度的戒

备。要消除他的顾虑，需要慢慢向他交底，于是又问道：“你是不是有点不敢向我说心里话呀？”

“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现在是戴着帽的人，又长期离开了革命的队伍，思想早就跟不上形势啦！说出话来不恰当，怕是重犯错误！”

“嗯，那么你对我们国家当前的政治形势知道一点不？”

“当前的政治形势？”张维丰又翻了翻白眼，“知道点也是道听途说，我这儿是孤家，听不着广播，报纸就更谈不上啦！队上开会，我是反革命，也没人找我，连我的女儿书也念不了啦！我只知道前二年，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都……去世啦！”说到这，他抽搐着他那苍老的面容，眼泪从失明的双目中痛心地淌了下来，滴在他那长久不刮的胡须上。

郑北星又问：“毛主席逝世以后的情况，你一点也不知道吗？”

“毛主席逝世以后……”张维丰用他那破绽的袄袖子擦了擦眼泪，“我让我小女儿到外边打听打听，说是党中央英明果断地粉碎了‘四人帮’，听到这消息，我对家里人说：

‘我们的党，我们的国家，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，这回有希望啦！’可我老伴说：‘怎么有希望，你也没希望了！就瞎一辈子，冤屈一辈子吧！’我说：‘不能，党和人民是不能让我冤屈一辈子的，早晚得给我平反！’唉！你看我唠哪儿去了！同志……您应该告诉我，您到底是县里哪个部门的呀？”

郑北星想了想，在这样一个可怜的，深受“四人帮”迫

害的老同志面前，不应该再跟他捉迷藏了。他的身体虽然已经残废，但他的精神，他的灵魂，并没有残废。应该把他的全部希望告诉他，让他鼓舞起来，振奋起来，便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张维丰同志，我实话对你说了吧，我是县委的。你的情况县委已经知道了，我这次下来又听了广大群众的反应，你是纯属于‘四人帮’迫害的冤案！今天，我是代表县委看你来了。我姓郑，叫郑北星，是两个月前组织上把我派到这个县任县委书记的！”

一听这话，张维丰一下子向郑北星搂抱过去，一时间激动得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是那只苍老的大手在郑北星的后背深情地拍打着，他失声地痛哭着。那冤屈的哭声和林中的风声交融在一起，哭得桑林落叶响，哭得苍鹰空中旋……

在此同时，郑北星也肝胆相照地把张维丰那衰老的身躯搂在自己的胸前……

好一阵，张维丰才伴随着自己的哭声，断断续续地说出一句话来：“郑书记……



我……我满腹冤屈没处说呀！我没有罪呀！”

郑北星两手紧紧攥住他的胳膊说：“维丰同志，县委一定要为你沉冤昭雪！”

“唉！”张维丰浑身颤抖着，“郑书记，县委要能为我这个冤案平反，我当然要衷心感谢党，感谢人民！可不过，县委是要替我担着很大风险的呀！”

“有什么风险？”郑北星理直气壮地说，“‘四人帮’迫害的案子就是要推倒！县委有这个权利！我回去就召开常委会研究！”

“咱们县的情况非常复杂呀！”张维丰担心地说，“有些人是专门找县委的邪茬儿，尤其爱在县委第一书记身上找楞缝，不能不高度的警惕呀！”

“我就是不怕有人找楞缝！”郑北星大义凛然地说，“县委所以能敢为你沉冤昭雪，是因为现在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！”

“唉！我……”张维丰万分激动地说，“要是能够看到你，该有多高兴啊！”

郑北星斩钉截铁地说：“维丰同志，你的愿望一定能实现！县委要千方百计想办法给你治眼睛！”

“那敢情好啦！”张维丰又把扔掉的木棒摸到手，“走吧，到我家去。要是队干部看见，就说你是我的什么亲戚。我不是怕他们，眼下还是瞒着他们点好，公社那个双突上来的霍书记在我们大队蹲着，可能找邪茬啦！”

“咱们光明正大，不怕他那些！”郑北星扶着张维丰，刚一迈步，就发现他的腿瘸了，便问，“维丰同志，你的腿坐麻了？”